



明代 艺文家族研究

杨 昇 著

MINGDAI
YIWENJIAZU
YANJIU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杨昇，浙江海宁人。2011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讲师，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已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艺术家族研究”(编号
14YJC2H181)资助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成果

明代艺文家族研究

杨 昇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艺文家族研究 / 杨昇著. —杭州: 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8-2140-3

I. ①明…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明代②艺术评论—中国—明代 IV. ①I20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2131 号

明代艺文家族研究

杨 昇 著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刘淑娟 白小平
责任校对 穆静雯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31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140-3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何处如家(序)

读罢杨昇博士这部关于中国艺文家族的论著,我便陷入了某种超越于学术范畴的思绪,眼前倏然浮现唐寅的《事茗图》——一个仿佛桃花源般的玄关,视野洞开,将目光牵引到无论魏晋般的梦幻远方。我能感受到高山流水,巨石苍松,飞泉急瀑,它们或远或近,或显或隐,既清晰,又朦胧;我发现溪水汨汨,草屋隐于松竹,门户大开,一人正在就读,案头茶壶茶盏,逸韵荡然飘出;我看到屋外老者手持竹杖,行至小桥,小童抱琴,尾随其后;我听到有人吟诗——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赅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而那个诵诗的人,竟然就是我自己……

也许,用心听,还会捕捉到另一个声音以诗的形式出现——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从此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为定义,几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向往。

中华茫茫九州,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杨昇博士以一部二十多万字关于明代艺文家族研究的著作,论证了数百年前这些才华横溢的族群诗意的崛起和他们的栖居、兴盛、蒙难以及远去。正是这些艺文家族,曾经如春日花朵灿烂开放,簇拥成中华民族的经典人文花园。

丹纳曾经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本书涉及的明代艺文家族,着眼点正在于此。它自然是有它特定的时空单元范畴、族群精神内核和艺文呈现形态的。诸如艺文家族的地域分布与概况,家族教育与艺文世家的兴起,姻亲网络与艺文家族的发展,艺文家族的活动空间,等等,都成为著作者重点

关注的焦点,以此构成了本书论著的重要内容。

如果按字索义,艺文便可以简单地解读为艺术与文学。通俗一些说,艺文家族便也就可以理解为一些靠琴棋书画诗酒茶便可以满足其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家族。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人口的增多,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使一些以艺文为生的家族次第崛起。但这亦绝非一个经济形态便可以解释的家族生存模式,因为数千年来,读书做官都是中国文人所认为的最理所当然的正道,历来士人必定以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琴棋书画不过雕虫小技而已。这不仅是一个生存问题,更是家国情怀问题。故儒学在前,艺术在后;科举在前,书画在后,一旦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般前后颠倒,父亲贾政便要往死里打板子了。

而即便在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下,有明一代竟然还衍生出如此之多的艺文之家,且根源也并非仅仅建立在艺文足可谋生的物质基础之上。他们对家族精神形态的确立,恰恰是建立在人性的自我认知上的,与其说他们躲进了艺术的小楼成一统,莫若说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向官道默然背过了身去,以做无声的抛弃。故他们从来未将艺文只做稻粱谋,他们对思想学说的研习甚至超过前代。因此,艺文在他们身上从来不是一门工匠般的技艺,而是一种承载着他们对生活全部认识的文化符号。我们不得不说,艺文家族对儒学的深入学习,对品性的自我修炼,对教养的高度重视,对传承的使命担当,以及对淡饭粗茶的欣然接受,正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觉醒。这个时代的许多士人,便成就了近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先锋。

而这样的家族叙事,自然带来时间的绵长与空间的开阔,便也使人在族群的纵向解读中深切感悟到家国命运。著作者既然选择明代为艺文家族的王朝坐标,便不可能不涉及异族骤侵、大厦覆倾、国破家亡的明清交替时刻,而诸多艺文家族的人文品相恰在此呈现出风骨。原来风花雪月与宁死不屈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众多大艺术家以粉身碎骨的殉道精神,在那个分裂的时代求仁得仁,使后来者深感中华文化的深刻、厚重与坚韧。

窃以为,这部论著的要义,正在于作者通过对这些艺文家族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研讨,启示今人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艺文之关系:栖居是要以诗意为根基的,而诗意地栖居,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内心的安详与和谐,以及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唯此才能分辨出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我们才能知晓,先人们早在六七百年前,便以艺文家族的诗意栖

居,寻找着人类的精神家园。

今天,一些如杨昇博士般的精神后人,正在掀开历史的厚幔,请那些高贵的诗灵画魂重登历史舞台。这或许恰恰是中华民族之艺文家族的特殊之处吧。纵然有再高的艺术才华,再深的文学感悟,也是要文以载道的。艺文家族的伦理传统决定了艺术家们与家国的关系,他们超越了一朝一代现世生活的桎梏,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了家族人文标本,让今人能够为他们的先人自豪,更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仰视机遇,以及心向往之的不二目标。

是为序。

王旭烽

2017年3月26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明代艺文家族的地域分布与概况	10
第一节 江南地区的艺文家族	18
第二节 其他地区的艺文家族	40
第三节 室家族的艺文传统	50
第二章 家族教育与明代艺文世家的兴起	68
第一节 德业的累积	68
第二节 家族教育	77
第三节 艺文世家的家族习性	99
第三章 姻亲网络与艺文家族的发展	107
第一节 姻亲网络的构建	108
第二节 艺文家族的发展	118
第四章 艺文家族的活动空间	124
第一节 园林:艺文交流的盘桓之地	124
第二节 山林:遁世自保的隐逸世界	172
余 论	184

参考文献	188
一、古籍	188
二、今人论著	192
后 记	197

绪论

家族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寄托所在。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①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群而居的中国人,在各项事业上努力劳作,逐渐取得不凡的成就,便形成了一个专门从事某项事业的家族。在文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家族,便可称为文化家族,或曰文化世家。家族生活和文化成就的取得,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血缘关系是最值得信赖和付出的天然联系,加之族人间交流的便利,使得文化、技能的传承更为迅捷通畅,从而促进家族文化的圆融和发展;另一方面,以家族形式出现的文人群体更能体现出文化成就的集群优势,由此大大提高文化活动的总体质量和成就。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家族层出不穷,这些家族或“世其官”,或“世其科”,或“世其学”,^②在科举、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各个领域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成就,并对所在地区乃至全国社会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潮与发展趋向。

考“艺文”之名,最早的意思是指图书典籍。班固《典引》中的“苞举艺文,屡访群儒”^③和历代正史中的“艺文志”之“艺文”即此意。后世的“艺文”一词意义逐渐宽泛,“艺”和“文”两字开始拆解,“艺”即艺术,“文”即文学,主要指向包含了书画(延及篆刻)和诗文两个范畴。因此,所谓的“艺文”家族,特指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同时取得较高成就的家族,换言之,即“艺文兼擅”的家族。

在中国古代,“艺”往往为“文”——程文、诗文之副,与读书属文密切关联的书法地位尚高于绘画。绘画作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延伸,并无关“正途”,易为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② 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邃汉斋文存》,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③ 萧统:《文选》卷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8页。

传统士大夫所轻视,明代的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就告诫儿子李肇亨:“士人以文章德义为贵,若技能多一,不如少一,匪徒受役,兼亦损品。”^①元代以前,专职的画家多为宫廷服务,并且往往被目为匠人,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是很高。元季之末,以放逸疏淡的笔致表现文人宁远心境的绘画开始流行,并在环太湖流域出现了“元四家”这样的大师,写意文人画逐渐和书法诗文一样成为读书人心境的写照,地位逐步提高。延至明代,书画技艺的传承也成为文化家族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之江南经济的发展,文人生存手段的多样化,艺术创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明代成为中国艺文家族发展的高峰期。由于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高度发展,带动城市工商业的兴盛,士大夫的出路不再局限于科举出仕,明朝政治的黑暗也使得一些有才华的文人无意介入政治,使得隐逸之风开始盛行。明代是文人画发展的勃兴期,经济的发展又使市场对书画消费的需求猛增,更促发了文人以艺治生的势头。因此无论从家族数量、艺文水准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明代的艺文家族都是其他时期难以比拟的。明代的众多书画大家,多是以艺文家族成员的面貌出现在艺术史上的,比如相城沈氏的沈周,长洲文氏的文徵明、文彭、文嘉、文俶,太原傅氏的傅山,常州恽氏的恽寿平,孟津王氏的王铎,诸暨陈氏的陈洪绶,等等,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大家,他们多受家族发展之惠,得以促成了自己顺畅的艺文之路,又通过自己的名望和实力,对家族的发展有所回馈。个人和家族相辅相成,造就了明代艺文家族大兴的局势。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到:“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②众所周知,艺文才华的获得,不可否认地会带有遗传的因素,中国书法讲究岁月积淀和内心体悟,事绘之初极重习学和临摹,而文学创作也需要巨大的阅读量和独到感触的培育,故诗文书画,自古便与家庭、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中国历代都曾涌现出众多以艺术和文学著称的家族,如魏晋的琅邪王氏、五代十国的成都黄氏、元初的吴兴赵氏、明清的长洲文氏等,基本上都有着书画技艺父子相承、代代相传的特点。有明一代,具有艺术特长和文学修养的艺文家族,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面貌,是中国艺文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众多艺文家族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版图上的重要景观,同时也是艺术、文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目前对艺文家族的理论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在中国艺术与文学的

① 李日华:《恬致堂集》卷三八《题儿子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8页。

②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研究中引入家族研究的体系和跨学科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促进学科交融、推动学术创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于艺文家族的研究,首先,能为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研究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因而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其次,相关的研究还能推动不同学科门类研究方法的融合,还原艺文密切联系的中国文人传统之原貌,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全面和深入。再次,目前针对江南地区家族的个案研究无疑是文化家族研究的热点。近年来,针对齐鲁、岭南等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世家的研究开始兴起,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针对西南、西北等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本书将对明代全国范围内的艺文家族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将兼及热点地区以外的家族,力争较为全面地反映明代艺文家族的发展原貌。此外,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研究近年来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热点,并涌现出不少专力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大家,如高居翰、柯律格等,相关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拓展与海外的学术交流。最后,艺术和文学的全面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于艺文家族的研究,将有助于为当代文化精神的重建提供学术资源与成果,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中国文化世家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多个领域学者的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区域文化与家族文化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并涌现出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和一批专注于此领域研究的专家。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中国文化家族(世家、望族)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对文化家族的总体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从研究时段上来看,既有通论性的研究,又有断代性的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家族制度、家族文学、家族教育等方面;从研究涉及的地域来看,包括了全国性家族和区域性家族的研究;从相关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涉及了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学等学科。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著作,对后来的研究影响颇大。前者列举了嘉兴地区 91 个世家望族,并制作了其血系、血缘网络、世袭流衍等多个图表,分析出 91 个望族血系的平均流衍世代为 8.3 世,时间达到了 215.8 年。潘光旦指出,决定家族兴衰的核心因素,在于优良的遗传、贤明的母教以及家族迁徙、联姻网络等。

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以家族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历代家族和家庭的形态结构和发展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论述。冯尔康《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社会》、岳庆平的《中国的家与国》、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等著作,对家族形式、组织、功能及政府的家族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陈支平《近 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以大量的族谱、契约文书以及民间调查材料,从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角度,对福建的家族

社会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断代研究方面,关于家族、宗族的研究居多,如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动态研究》、阎爱民的《汉晋家族研究》、王善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徐扬杰的《明清家族制度史论》等。

更多地针对文化世家研究的论著,有吴仁安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着重记叙了明清时期一批上海地区望族名流的生平和门祚,论述其盛衰消长的原因和社会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在对明清江南望族做典型分析和专题研究之后,以地方望族为贯穿线索,深入探讨了江南城镇及其经济、江南商人与商帮、江南社会风尚与风俗民情等江南社会经济史中的重要问题。《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分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及其所属主要府州厅县著名家族概况、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考录两编,该书站在综合论述的高度,探究了明清时期江南著姓望族的兴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历史,及其对当时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以家族发展的社会环境为依托,探究了苏南望族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过程、文化特征、家族教育、人才优势、家族文献建设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将关注点放到了家族中的女性成员和家族间的文化交往上来。徐茂明等所著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一书,以“文化世族”为核心概念,通过对文氏、王氏、叶氏、彭氏等著名家族的深入挖掘,全面研究了明清以来苏州地区的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系统分析了家族迁徙与区域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家族如何通过经由联姻、科举、仕宦、交游等途径累积的社会文化资本影响地方社会的走向。朱丽霞的《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在松江府望族的文化背景下分别对宋、王等家族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论析。凌郁之的《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在苏州文化世家的文化生态背景下,探讨了多个文化世家的对文学的培育、建设和推进。王建科的《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从叙事学、家庭社会学、主题学及历史文化批评的角度,对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的内容及其艺术形式进行系统研究,切入点较有新意。王树春的《家族文化补遗:胶东文化研究》对多个该地区有代表性的家族进行了个案分析,内容包含科名、政绩、著述、联姻和人文活动,并对莱阳地区明清两代望族文化进行了综合评价,揭示耕读传统对一地文化脉络的延续。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从诗书之家的培育——书塾、书院、文社的构建,家族女性、母教与联姻网络、私家宅园与家族文学的联系、家族文献——地方性诗文总集与家集的交织,家族文学传统的塑造,等等多个具有新意的角度切入文化世家和家族文化的研究,采取了重要问题研究与家

族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可谓成功的探索。

第二,对文化家族的个案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真瑜就发表了对文化世家个案研究进行关注的文章——《明代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世家》,此后他又对该家族(吴江沈氏)进行了逐步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了系列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明清吴江沈氏世家百位诗人考略》等。台湾学者对一些文化世家的研究成果也在那个时代逐步问世,较有影响的有赖慧敏的《明末清初士族的形成与兴衰——若干个案的研究》、王家俭的《昆山三徐与清初政治》等。近年来,对文化家族个案的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生选择其作为研究对象,每年都涌现出不少有质量的成果,如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沈如泉《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

在文化家族研究的理论提炼方面,在坚实的文献积累的基础上,李真瑜把研究领域从家族个案拓展到对文学世家现象的学理性总结上去,发表了《世家·文化·文学世家》《文学世家:一种特殊的文学家群体》等论文,将文学世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行了讨论。罗时进在一系列论述(专著《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论文《明清近代诗文研究:明清家族文学研究》《太湖环境对江南文学家族演变及其创作的影响》《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雅集与文学创作》《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文学文献建设》《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姻娅网络与文学创造力生成》,等等)中倡导在地域和家族的视野中重新展开对古代文学的研究,提出加强家族文学“文化性关联”的探究,并且重视以朴学的态度,在深入挖掘文献价值的基础上兼容多元的方法,以推进研究的深入。梅新林在《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论著中强调了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积淀、人才培育等核心要素在世家发展兴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梅新林、陈玉兰在《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一文中指出,对文化世家的专题研究(如对学术、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医药、藏书、刻书、商业等不同类型世家的研究)是未来文化世家研究中可供突破的方向。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在某一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文化家族(江庆柏称为“专门家族”)的研究,也开始为学界所关注。比如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一书中,较早提出了“科举家族”这一概念,对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地域流动、地位变迁及家族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择取了几个典型的科举家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分析。厉震林所著的《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一书,以文化人类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突出大文化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伶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家族文

化的研究,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突破了个案、区域和断代的束缚,具有宏观而整体的通论性质。其对伶人家族的文化基质、结构系统和功能形态的分析具有新意,对此前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一种突破。相关成果还有吕贤平的博士论文《明清时期全椒吴氏科举家族及其文学研究》、丁蓉的博士论文《科举、教育与家族: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研究》等。除科举家族之外,较为多见的是对文学、曲学、学术、出版等专门世家的研究,如孙艳庆《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研究》、张丽《北齐隋唐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钱茂伟《明代的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殷亚林《明清江南家族与曲文化研究》、钱慧真《清代江苏的经学世家及其家学考论》、许振东《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与书坊考述》等。

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文化家族的研究有所启发和推动。学界对家族姻娅关系在家族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视,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一书,对清代中国各省的文学世家的姻亲谱系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梳理和编订,强调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发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佐资料。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述》、丁小明《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等论著中,都提供了相关文化家族的文献知见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的文献支持,不失为一项有见地、有意义的重要工作。

对艺文家族的研究,则显得相对冷清和薄弱。潘光旦曾从人类学、社会学、遗传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的绘画人才及其家族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诸如《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一个世家家谱之分析——明清两代的长洲文氏》《论长洲文氏画才之渊源》等论文,但由于这些研究只是其宗族、人口和血缘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故未能展开探讨。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对东晋的门阀氏族和文艺世家进行了综合考论,并分析了这些门阀士族型文艺世家的共性、个性与形成原因,以及文艺世家对推动文学艺术发展所起的作用。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一书,对该家族的书法、绘画、音乐艺术成就进行了论述总结,并探讨了家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对清代著名书法家杨沂孙及其家族的世系、组织和文化遗产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并对其族人行迹进行了详细编年。邢学敏《北魏书法家郑道昭家族研究》对荥阳郑氏家族成员的生平、联姻、艺文创作及家族风格进行了论述。丁小明的博士论文《清代江南艺文家族研究》明确提出了“艺文家族”的概念,并对清代江南的艺文家族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艺文家族的家学传承及其与艺文创作流派和江南社会的关系。

还有部分期刊论文对艺文家族进行了关注,如周巩平《艺术家生平与谱牒研究》强调了艺术家的生平和家世研究在艺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包铭新《嘉兴郭氏家族的绘画传统及其历史意义》对“有家族传统的书画家群体”嘉兴郭氏进行了关注。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国古代绘画》运用人类学谱系的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家学”问题,并通过中国历史上多个绘画家族的实例分析指出家族及家学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显著影响,从而提倡对画家个体、群体生存环境等全方位研究的深入展开。刘镇《论长洲文氏家族与明代江南刻帖之繁荣》从文氏家族的《停云馆帖》入手,探讨了明代江南地区书法刻帖繁荣现象的内因。

近年来,大量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被译介传入中国,他们的研究方法多注重通过对艺术作品和相关文献的缜密考察进行艺术事件及其社会背景的历史还原。他们的研究,相当一部分与中国古代的艺文家族密切关联,如李铸晋对吴兴赵氏、柯律格对长洲文氏、白谦慎对太原傅氏、李慧闻对华亭董氏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全面和深入的程度,足备中国学者进行参考。

综上所述,目前对包括艺文家族在内的宗族、家族和文化世家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硕,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不断拓展,并日益呈现出精细化、深入化、综合化、国际化的趋势,但仍存在一些缺憾和可以拓展的空间。首先是侧重于个体研究而忽视综合研究,“少有人致力于贯通、综合和整体解释,忽略了历史文化发展的大势和精神”^①。学界亟须更多将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与断代研究相融合的综合性成果。

其次是侧重于现象描述而忽视理论研究,多停留在对家族源流和历史的陈述、家族成员和文化成就的简单汇集评价上,研究的视角、手段较为单一,思维方式往往陷入模式化,缺乏学理的厚度和深度,从而造成研究结论的大同小异。关于文化家族的研究理应有宏观理论的统领,在相关论述中也应有“家族文化”的聚焦点,而不应以铺叙家族历史及其文化创作成就为满足。描述事实固然重要,学理性提炼方是大乘之境。

再次是研究对象在地域分布上的严重不平衡。其表现是对江南、中原等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对西北、西南等地区文化家族的研究则相对滞后,成果寥寥。这一现象虽然是由文化家族的历史发展状况所决定,但学界对热点地区以外的文化家族的关注度,仍有加强之必要。

最后是一些特具意义的内容应有进一步的扩充和阐述。中国的文化家族往往本身就具备综合性的特征,因此对他们的研究,也需要具备综合性的

① 黄宽重、刘增贵:《家族与社会》总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眼光,运用综合性的手段,相关研究亟待进行学科和研究方法的整合。有不少已被纳入文学研究视野的家族,如海宁查氏、吴江沈氏、常州恽氏等,都是艺文并重的大族,在研究中理应强化对其艺术成就的探讨,从而还原其艺文家族的原貌。此外,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应停留在少数知名家族之上,对于大量有特点而因经济、文化资本匮乏从而形态涣散、文献稀缺的家族,也应予以重视,从而使相关研究更为全面深入。

本书将针对明代艺文家族的生成因素、时空分布和姻娅关系进行探讨,考究明代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发展状况与艺文家族勃兴现象之间的关联,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方面分析明代艺文家族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分析明代京师、江南、西北、西南、华北和岭南等各地区艺文家族的生成、流动和绵延概况。教育与传承——明代艺文家族发展的内部动力、政权与社会——明代艺文家族发展的外部助力是艺文家族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两个支撑点,本书将对包括艺文才华的遗传、家族内部的教育与交流、婚姻选择及姻娅网建构、家族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建设、家族社交圈的营构等因素进行探讨。

本书将通过明代艺文家族的产生、发展与衰变历程的梳理,讨论其创作实绩、社会反响和历史地位。探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艺文家族的风貌和特征。通过代表性家族的个案分析探究明代艺文家族的演变、衰落因素。力图通过对明代艺文家族的众多实例的梳理和分析,描绘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概况,客观揭示其基本特征,系统总结其中的规律与启示,科学分析其历史作用和地位。园林和山林是明代艺文家族内部活动与对外交游的两个典型的场所。园林的构建不仅承载着文人士大夫们栖居城市山林的终极梦想,更是家族经济文化积累达到一定水准的标志,象征着家族的勃兴和发展的顺畅。而在明代,艺文家族一旦有了一些资本,往往会倾力于园林的建设,这种现象不仅在江南出现,在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体现了明代文人,特别是艺术家们生活情趣的走向。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遗民”涌现的一个高峰时期,不少士人以身殉国,而他们的子弟,更多地走向山林,成为不愿为新朝服务的隐居者。遗民现象在艺文家族中尤其多见,一方面,多数艺文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会与中央或地方政权产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易代之变对这些家族而言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艺术家的性格本身就有放逸的一面,新的统治者的君临,往往会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野逸情怀,在“不合作”的表象下走向山林,完成对人生另一重境界的体验和追求。因此,对明代艺文家族的这两重活动空间的讨论,不仅抓住了艺文家族的一些根本特征,而且对明代家族文化研究的推动而言,也是一种有新意的探索和尝试。

笔者希冀通过本书的相关研究,推动学界对艺文家族的进一步关注,促进